

追忆

贵州石阡，追寻红军跳崖的悲壮往事

家史

姨妈与幻想诗

李晓达

我有三个姨妈，加上亲妈，她们一共四姐妹。这四姐妹都是老师，也都是很聪明的人。

比如我姨，记忆力超群，以前我找她问亲友手机、家里电话，她都是马上背出来的，从不用查电话本。现在上了点年纪，背号码的绝技差了点，但也是自带通讯录功能，一秒就能排查出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人的远亲身份，中间有时相隔十几重亲缘外戚，当事人之前想都没想到。二姨年轻时做得一手好针线，不管杂志上还是电影里的什么服装款式，看上一眼回家就能做出来。三姨教书时是远近闻名的数学老师，心算了得，长期教毕业班，还辅导学生得过全国奥林匹克奖。小姨是她们那个年代，从乡下考到外省的“名人”，现在是个大学老师。我这几个姨妈的聪明才智，相对于她们成长的乡村环境以及时代而言，很了不起了。

这几个聪明的姨妈，经常随意一句，已是惊人之语。她们聚在一起说话时，偶尔会调侃地夸对方“善天益地”。文绉绉的，挺别致，所以我也记住了。一日家人微信群里，大家在夸我妈能干，我便发了一句“善天益地”调侃一下。

没想到，我妈回了我一句，“是掀天揭地”，又说这来自胡大川的幻想诗里一句，并打了那句诗发出来：“揭地掀天为事业，翻江倒海泻文章”。我还来不及得及惊讶，我的二姨，把整首诗逐字打了发出来，又连着用语音，背了好几首胡大川的诗。我的小姨妈从网上，找到胡大川幻想诗全篇，贴了上来。几个姨妈，开心地讨论起了幻想诗。

胡大川何许人也？清代嘉庆年间四川一个普普通通的举人，写过十五首诗，皆充满浪漫幻想的字句。其诗当时籍籍无名，直至民国时被其后人带至日本，并再传回国内，才在国内传播过一阵，但现在知道的人可不多了。我这几个姨妈，聪明是聪明了点，可也没听说对诗词还有研究，怎么会对胡大川的幻想诗，如此熟悉呢？难道这几个姨妈，以前还一起学过诗？

二姨妈自己交代了。文革后期的特殊年代，无书可读，四姐妹都失学在家，只能织补渔网补贴生活。因我家订了份《光明日报》，我外祖父的挚友、家乡著名文人刘振亚先生，每天便到家中看报。那时候物资紧张，家里茶叶也没有，刘先生坐一天也喝不上一杯茶。刘先生除了看报，就是和我外祖父聊聊天。两人都是文化人，聊得来。外祖父原是中学语文老师，文革期间被划成右派，书也教不了，只能在学校里负责敲钟、喂猪。在我家看报、闲聊之余，刘先生就给姨妈们教这胡大川的诗，他一句一句念，姨妈们就一句句跟着背。她们一边织网，一边就把胡大川的十五首七言律诗全背下来了。

当时的姨妈们，才是十来岁的小姑娘。近五十年过去了，因后辈一句无心的话，引出她们半世纪前的回忆——她们也把这些幻想诗，记了近五十年。

刘振亚先生读过南京大学，曾为同盟会会员，号“大同氏”，是家乡旧时有名的知识分子。刘先生应该是在读书时，接触到胡大川的幻想诗。可在文革末期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里，刘先生为什么会突发奇想教我的姨妈们背诵幻想诗？是因为看这几个聪慧的姑娘无书可读，让她们背背诗学点知识，聊以借慰？还是用诗中“好花常令朝朝艳，明月何妨夜夜圆”的愿望，鼓励这几姐妹乃至她们一家？或是借诗中随心幻诞之意，向几个小姑娘们诉说当时的时代与社会的奇异之处？又或者，是否也有“但愿百年无病苦，不教一息有愁魔”的祈盼？

而我的姨妈们，当时能否知道诗中的意义与身处的境况？当年学习成绩皆优异的她们，才小学就无书可读而只能背诵幻想诗，心中意味又如何？待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已成年的她们都接连报读了各类大学专科，并各自成为大学、中学、小学的教师后，回想起当时织网背诗的往事，又是何心境？再大胆设想一下，如果我聪明的姨妈们读书成长时，能够在现在的时代，得到良好的教育，她们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刘振亚先生已仙逝。而当年背幻想诗的小姑娘们，现在也已退休或将退休，都有着安宁的生活。上面那些问题，无须再问。

姨妈们带着笑意又再问，纷纷回忆当年背下的诗句，向于侄们炫耀自己过人的记忆。“一双笑眼常无泪，百岁童颜不作翁。”五十年前，一个风浪未平的海滨边陲，一处孤寂小屋中，四个小姑娘一边拿着网投织补渔网，一边吟诵与当时的时代、生活毫无关系，同时又充满离奇想象的诗句。这个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因一句不甚出名的旧诗中的几个字，而被当时还没出生的我，在半个世纪后知悉。仿佛隔着一只古旧而依然清晰的望远镜，将故乡、故人、往事、时代等等支离破碎的事物，糅合在一起而重新拼接成旧貌，在五十年后一并显现出来。

捉错园

秦殿杰

(609)

“从小就耳濡目染”，

句中“濡”是别字；

见多听多受影响，

正写是“耳濡目染”。*

*濡：沾湿；染：沾土，比喻听得多见得多，无形中受到影响。此系成语，不可改动一字。

(待续)



▲ 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

摄影：李惊亚

弹伤都生了蛆，后来我父亲改了陈姓，定居在马槽溪村，在这成了家，一直给我爷爷养老送终。”陈德昌说。新中国成立后，陈世荣担任农会主任、大队书记27年。他后来又认识了两个幸存红军，他们一直有往来，每年都要去跳崖的地方祭奠战友，直到陈世荣2001年去世。

陈德昌在石阡县大沙坝乡卫生院当医生，父亲去世的第二年，陈德昌入了党。他说，父亲生前经常想念部队，想起红军时候的生活，唱红军的歌，父亲对家人的叮嘱至今在他脑海里回响：“全国解放不容易，你们都要珍惜，要好好工作，好好务农。”

“红军跳崖人数在100人左右”

当年的困牛山村属于石阡县和思南县的交界地带，两县对这段悲壮的历史都没有记载，因此一直尘封着。上世纪70年代，当地公社还组织群众下河打捞红军战士遗骨，但很少被外界知晓。

2001年，38岁的杨又铸任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一次偶然的机，他接触到困牛山战斗相关资料，他问身边同事：困牛山到底在哪？没有人能说清楚。

杨又铸曾在乡镇工作，有不少熟人朋友，他就托人四处打听，后来听说龙塘镇有困牛山这么一个地方。“我在龙塘镇找到困牛山村，一去就碰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亲眼看见红军跳崖，”还有其他目击者，他们带我去看了跳崖的地方。”杨又铸说。

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杨又铸走访了困牛山村及周边十多个村庄的100多名亲历者、亲历者后代和幸存红军后代。其中，目击当年红军跳崖的村民9人，都已八九十岁高龄，而能确认身份的幸存红军已全部离世。

为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杨又铸多次专程到贵阳，恳请一些老党史专家帮忙搜集资料，“他们听说后都很感动，想到实地祭拜，但那时从贵阳到石阡坐车要两天，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实现，我就在石阡做实地调查，他们帮忙丰富完善资料，有的专家甚至到北京，去军事博物馆抄录资料。”

在走访中，蔡应举、滕久全、安天明、姚

祖华、张著明等见证者，向杨又铸回忆了让他们毕生难忘的困牛山战斗：那天，他们听到“黑滩河沟里枪声噼里啪啦地响”，“首长(团长田海清)被打死，红军战士放声大哭的声音”。看到跳崖的净是些十五六岁的娃娃，跳崖牺牲的红军“一窝窝”(意思是“一群群”)，“一个红军飞下崖去屁股插在树桩桩上”。

你一言我一语，尘封的历史越来越清晰。有人说，红军到了困牛山，给孤寡老人田大娘十多块大洋，还有人说，住宿卢万培家屋檐下的红军走时留下一段黄州白布。

“这些老人回忆，红军不怕死，与敌人肉搏，打穿制服的敌军一枪一个准，只是不打拿棍棒的百姓，把枪打得很高。”杨又铸说。困牛山战斗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虎井沟河边一带，到处都能见到红军烈士的遗骨。

据贵州省党史专家综合分析党史、军史资料，历史档案记载，以及实地走访调查和考察，红军跳崖人数在100人左右。

国民党军队离开后，群众明白红军并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救护红军，待伤病治好，体力恢复后，又送红军上路到印江县寻找主力部队。除了陈世荣，被村民主动救了下来的红军还有很多。群众不怕国民政府查办，收藏红军遗物、安埋尸骨，传颂红军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失散红军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爱护。陈世荣常应邀到附近学校等单位讲述当年红军跳崖的英雄事迹，每次都深深打动师生心灵，引起强烈共鸣。蔡应举常说：“红军、红军，血肉相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红军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200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杨又铸拿出自家准备购买小轿车的10万元，自费出版了心血著作《困牛山红军壮举》一书。

红军在面对百姓误解，把他们当成匪来打的情况下，依然把百姓当亲人，把生的希望留给百姓，自己选择了死，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杨又铸感叹说，“出版这本书，是贵州一批老党史工作者的心愿，那么多红军牺牲在这个地方，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作为基层一名党史干部，有责任把这些记录下来，或许能让世人受到一点启发。”

本报记者李惊亚、崔宇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63岁头发花白的陈德昌每当轻声哼起这首歌，心中总会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愫。

这首曾流传于中央苏区的民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是他的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歌曲，从小陈德昌就时常听到父亲唱起，在心里深深埋下了种子。他知道，这是父亲在部队时经常和战友们唱起的歌。有时他也在思索，父亲唱歌时的心境。或许，那些跳崖牺牲的战友们，会在低沉的旋律中，一个个都活过来吧。

那是一段尘封已久的悲壮往事。

“宁可死，也绝不打老百姓”

陈德昌的父亲叫陈世荣，原名何步荣，出生于1915年，籍贯湖南郴州市汝城县，9岁父母双亡，12岁参加游击队，从家乡出发到达井冈山，在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任司号员。

1934年8月，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两个师六个团共计9700余人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陈世荣当时19岁。

10月5日，红六军团五个团进入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石阡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西南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设石阡府，1914年改府为县。石阡县是佬侗、侗、苗、土家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同时受到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影响。

7日，红军遭遇桂敌，甘溪战斗失利，红六军团被截为几段，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重围。部队分头突围转战，15日抵达龙塘朱家坝，准备从板桥渡石阡河去印江，不料被敌军先抵板桥设防，故我咫尺。

16日，困牛山战斗打响。军团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拟二进甘溪出石阡。红十八师师长龙云和五十二团团团长田海清率800多名红军战士断后，目的是拖住全部敌军和地方民团。

困牛山山势南高北低，随处可见悬崖绝壁，像一头巨兽静静伏卧着。当年的石阡百姓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为防止野兽侵袭，每年烧山，山上杂草丛生、树木稀少。困牛山南、西、北三面有黑滩河环绕，只有东部的地势稍缓。南端的虎井沟，宽不足10米，长约300米，靠着困牛山的悬崖，最高有70多米。

陈世荣生前向家人回忆，红军刚上困牛山就听到土匪打枪，发觉被埋伏。红军与敌血战，师长龙云率200余人冲出重围，但由于头一天部队误食桐油，很多战士拉肚子，加之老百姓被敌人裹挟走在前面，不便展开战斗，团长田海清壮烈牺牲，部分红军一步步被逼到虎井沟悬崖边。

“当时他们连长喊，把枪甩下河去，一起跳崖，我们不能落在敌人手里。”陈德昌说，“父亲说，跳崖的时间在下午，他知道崖很深，但他怕伤了老百姓，没有狠狠地打，他也不愿做俘虏，宁可跳崖。”

陈世荣个子小，又拉肚子，浑身没劲，跳下去就被一根藤缠住了。等敌人散去，第二天天快亮时，他抓着藤从虎井沟爬上来，把身上的号和马灯藏起来，沿着黑滩河往出走。

一起爬出来的还有两个幸存的红军战士。他们到川洞就分手了。陈世荣从川洞打石场走到水井坳后，被土匪捉住要杀，一个路过的地主说：“他还是个娃娃，杀他搞哪样，杀了是灌血”，把他救了下来。后来陈世荣被当地人陈国善收养。

“我爷爷见到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头上的

诗话

余凤

近年来，浙江省将打造“钱塘江唐诗之路”作为建设诗画浙江大花园的重要举措来抓。常山县是钱塘江源头县，建县于东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有着1800年的悠久历史。在浙江常山的历代文学作品中，唐诗是非常少的，据不完全统计最多也就二十首，元明清的作品也不多。但令人意外又惊奇的是，常山的宋代诗歌数量却车载斗量，非常突出。如果说宋代是常山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高峰期，那么数量惊人的宋诗，则是宋代留给常山最重要的文化瑰宝。在普遍流行“宋词”的宋代和以“唐诗之路”著称的千里钱塘江上，百里常山却偏偏以“宋诗”闻名，可谓“离经叛道”、独树一帜，堪称是非常独特的“常山现象”。我们经过研究分析，发现这一“常山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首先，常山本地的文人学子在宋代科举界异军突起。科举制度起于隋，兴于唐，并一直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直到清朝灭亡，方才废止。在隋唐及至五代十国时期，常山史料未见到有常山人考中进士的记载，但到了宋代，常山考中进士的人却一下如过江之鲫。常山历史上总共共出一百三十八名进士，仅宋代就占了九十六名。另外元代有六名，明代有二十九名，清代有七名。其中，宋版乡汪韶“一门十八进士”；章舍贤良王氏“一门九进士”，被誉为“历朝笏满床”；何家乡江氏历代进士达到十九名，被誉为“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像这样多个家族扎堆考中进士现象，聚集于一个小县，在全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许多人包括学界一直以来都以为常山乃至浙西衢州，真正文化兴盛是“宋室南渡”。北孔南迁到衢州以后，现在来看是有

所偏颇的，只能说南宋是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应该在北宋就已经出现。而且从考中进士的人数这一标志性数据来看，常山在南宋的人数不如北宋时期多，这也证明了常山在宋代的文化兴起不是靠外来力量，而是内生的。

其次，常山在宋代名人辈出堪称空前绝后。汪韶是常山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官至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章舍人王伟，比汪韶晚六年中进士。王介，字中甫，仁宗庆历六年登进士第，应试直言极谏科，名列贤良第一(苏轼得第二名，苏辙得第三名)。王介与当时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交往甚密，是仁宗至哲宗时期著名诗人。王介和王安石在南京府学读书时是同学，有多首唱和诗存世。他去世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均为他写了挽诗。王介的儿子王涣之，与书法大家米芾志趣相投，交情很深。还有何家乡源口村为减民负沉籍于江的江景房及其后代江少虞、江纬、江裘，以治家格言之作《袁氏世范》备受世人推崇的袁采等，都堪称是宋代闻之如雷贯耳的名人。尤其是北宋灭亡、宋室南渡之后，大批来自北方的官员和名人“南漂”到了当时的常山寓居，使得常山更成为名人荟萃之地。

另外，经济发达、寺庙众多成为“南渡”名臣文士的宜游宜居宝地。浙江西部历史上本是“东夷之地”。但“五胡乱华”以后，来自北方常山郡人为了逃避战乱，随东晋“衣冠南渡”逃难到当时的定阳县境内，在一个适宜发展农业生产的地方聚居下来，这个地方后来就被称为“常山乡”。由于这些人来自燕赵发达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因此常山乡很快兴旺发达起来，到了唐咸亨五年(674年)始设常山县，

将县治也从原定阳县(今何家乡钱塘村一带)迁到了常山乡(今招贤镇古县村和古县畈村一带)，属婺州。因此到了宋代，常山县在浙江一带比较发达是完全可能的，也因此才能吸纳和养活那么多追随“宋室南渡”从北方逃难来的人。同时，常山在唐、五代及宋年间佛教非常兴盛，寺庙众多，《珊瑚阁诗话》卷二记载：“两浙、福建诸州，寺院至千八百区。”现今保存完好、香火不断的唐宋时期的常山古刹就有万寿寺、石嵒寺、福田寺等多座，并出现过无相大师、桂琛禅师、宋高宗专门下旨，让“南漂一族”到寺观以居。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许占寺院》记载：“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难者众，高宗怒之，防有西北士大夫许占寺之命。”由于经济富裕，寺庙众多，常山于是成南渡士人的重要安身之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寄居黄岗山万寿寺的“中兴贤相”之首赵鼎、两朝帝师范冲、魏征之后魏虹等史上著名的“三贤”。《常山县志》卷十八《建置·寺观》载：“永年寺，在县北三十里，唐大中十年间建，宣宗赐额，曰容华，宋雍熙改元更万寿罗汉寺，祥符六年改赐今额，赵鼎、魏虹、范冲避地南来尝寓此寺。”

水陆转运、舟车汇集的交通枢纽优势和风景秀丽的风光，常常吸引大批诗人流连忘返。常山古称“金川”，自古以来就是水陆转运、舟车汇集之地，宋室南渡以后，更是连接南方诸省的重要枢纽，繁华一时，古诗曾以“日望金川千张帆，夜见沿岸万盏灯”来形容当时航运之繁华。常山江又是一条景观之河，从石门佳气到十里长风，从紫港浮桥到招贤古渡，秀丽风光令人流

“虽硝烟散尽，但丰碑永存”

如今的石阡县，虽属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资源丰富：拥有世界少有、国内独有且储量丰富的地热矿泉水资源，有面积38.5万亩且获“中国驰名商标”的苔茶资源，有储量达15亿立方米、品种达22个之多的石材资源，是“中国温泉之乡”“中国矿泉水之乡”“中国苔茶之乡”等。红军两进石阡，留下大量的红色革命印迹，1992年石阡被列为贵州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这些年，46万石阡人民正发起另一场决战：2014年到2017年共实现7万人脱贫，目前的贫困发生率已降至9.12%。2173平方公里的红色土地上生机勃勃。

红军跳崖的故事仍在当地流传着，老人、孩子耳熟能详。今年50岁的困牛山村村支书张国玉记得，自己从小就经常跟随爷爷和父辈们到虎井沟的悬崖下给红军烧纸祭奠。

“不光我们家，很多村民清明都要来，虎井沟路边的岩石都被焚香化纸熏得漆黑。”张国玉说，“听老人讲，当年国民党拿群众当人质，红军不愿意伤害群众，很多人从崖上跳下来，净是些年轻娃娃。”

2008年，石阡县委县政府与红二方面军后代共建困牛山纪念碑，萧克将军题写“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碑名，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碑文，9位老红军、老将题词。

困牛山纪念馆位于困牛山村赵家山组，距离石阡县城40多公里。连绵的大山远接天际，一片苍翠中掩埋着多少忠骨，没有人知道。位于半山腰的“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高10.5米，底座长9米、宽3米，呈火炬状。碑主体右为红六军团军旗，左为困牛山，旗与山融为一体成丰碑。

碑座下方，刻有“千秋功绩在、碑树人心中”“名垂青史、光照后人”“长征英烈、永垂铭记”等字样。

困牛山战斗遗址建成后，一直由村里负责维护，张国玉和村干部经常轮流打扫这里。2015年，一些红军后代曾来此祭扫，栽种下的十几株常青树至今枝繁叶茂。

顺着陡峭的山坡往下走，当年红军跳崖的地方虽然找不到了，但已经荒草丛生了，接近悬崖顶部边缘，可听到下方河滩的湍急水声。到崖底有一条小路，非常难走，需要步行一个多小时。

硝烟散去几十年，困牛山下，村民们过着宁静的日子。困牛山村是个少数民族村寨，现有人口1379人，其中贫困人口415人，村里通过养猪、种花椒和蜂蜜李等特色产业带动脱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8年已接近6000元。

张国玉说，2014年，困牛山战斗遗址被列为铜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后，来参观的单位和人越来越多，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激励和鼓舞着更多人。

“据我们所知，这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跳崖壮举。”贵州省长征研究专家、遵义医学院教授谷松岭说，困牛山红军跳崖，是爱民壮举、民本壮举、英雄壮举。

贵州省党史办副主任覃爱华做讲座，经常讲到困牛山红军跳崖壮举，打动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没想到历史上曾真切切发生过这些事，红军有这么壮烈的事情，听众们也会体会到新中国创建的艰辛。

“长征先遣队后来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坚持在根据地斗争，做出巨大牺牲，体现出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精神。”覃爱华说，“我们有幸，生在和平年代，虽硝烟散尽，但丰碑永存。”

连忘返，至今依然如故。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游历常山、在诗中描写常山的诗人有一百多人，尤其以宋代为最多，曾几、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朱熹等鼎鼎大名的诗坛巨匠均赫然在列。江西诗派的诗人曾几，在游历常山三衢山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三衢道中》：“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成为曾几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更是至今古诗中描写衢州的知名度最高、衢州人传唱最广的作品。在诸多诗人当中，“南宋四大家”之一杨万里可以说是与常山情缘最深的大师级诗人。他是江西吉水人，又长期在杭州做官，因此多次来往途经常山，据考证写过与常山相关的诗歌多达四五十首，其中收入《诚斋集》流传于世的就有二十五首之多，很多常山古地名可以在他的诗中找到。